

李泥

著

历史伤口

——二十年寻访右派实录

李泥著

历史伤口

——二十年寻访右派实录

图书数据

历史伤口 / 李泥著. —北京

I. 历… II. 李… III. 纪实—中国—当代
IV 1258. 8

责任编辑：郑海天 脚 印

装帧设计：云 香

历史伤口

Li Shi Shang Kou

李 泥 著

字数 278 千字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1

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印刷

定价：20.00 元

目 录

1	这是为什么——代序
5	张若名和她的儿子杨在道
41	匡书记冒烟了（上）（下）
64	刘雪庵与《何日君再来》
98	一位父亲和他失散多年的孩子们
113	孙霖老先生的晚年
125	音乐学家黄翔鹏
173	阿珍之死
188	我的亡妻卓非
194	一个东江游击队员的遭遇
225	反面教员二十二年
234	父亲遗留的日记
294	未划右派的右派
307	[附]采访手记
321	后记

这是为什么？(代序)

郑海天

凡是经历过或关注过 1957 - 1958 年的反右斗争的人，看到我这里的题目，也许都会大吃一惊：

想当年，就是一篇以此为题的《人民日报》社论，播响了反右派斗争的战鼓，敲响了上百万知识分子的丧钟，进而造成了至今遗患无穷的灾难性后果——在中国知识分子中，毁弃了自由之思想、独立之精神；在整个社会上，几乎已完全颠倒了真善美、假恶丑的标准。良知泯灭，道德沦丧，偌大一个具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，从此进入了恐惧与谎言相交织的时代。面对中国历史上这一场空前的民族大灾难，许多人早就想反问一句“这是为什么”了。

是呀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

就像此前的反胡风运动，把明知不是反革命的胡风打成反革命一样，这场反右斗争又从中央到地方，把一些明知不

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，其中许多人只不过是说了几句大实话，或者是提了几条现在看来完全正确、甚至是远见卓识的意见而已，更不要说那些什么也没说、只是不会抬轿子拍马屁、见风使舵而“活该倒霉”的人了。把这些本当成为国家建设的骨干、甚至精英的人都打成右派，完全剥夺了他们的人格尊严和公民权利，并酿成了一幕幕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的人间悲剧——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啊？读了李泥的《历史伤口》这本书中的每一篇文章，都让你不能不想到这个问题，而且不能不得出自己的结论。

德国前总理科尔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50周年时发表的声明中说：“所有这些回忆和感觉是各不相同的。因此，我们应当把这些当作各种人的生活经历来尊重，不去破坏它。我们应设法敞开心扉细心聆听他们的声音。这需要有一种回忆和沉思的气氛。”同样，对于反右斗争以至我国的每一段历史，也都非常需要这种回忆和沉思的气氛，非常需要尊重和聆听各种当事人的亲身经历，从而使我们能够在直面历史真相、原貌的前提下，重新唤起并不断凝聚一代又一代人对历史的思索，从中总结教训，鉴往知今，避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重蹈覆辙，再遭灾难。本书所做的，正是这样一种郑重的工作。与此相反，如果对历史的本来面目任意取舍涂抹，对历史的经验教训故意装聋作哑，怕从镜子里照出什么丑来……那么，耻辱也许掩盖了，但尊严也不复存在；痛苦也许会被淡忘，但新的灾难就可能已在酝酿。

伤口可以愈合，境况可以改变，民族的记忆却永远不能消亡，因为过去的历史永远不会对我们失去意义。如果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，那么，想方设法让人们忘记过去（譬如不问你讲的历史真实与否，先给插上个什么政治标签，甚至干脆规定不许讲这一段或那一段历史，否则就是什么什么

罪)，又意味着什么呢？

要问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给世界留下些什么，我想，对于写作者来说，最有价值的，也许就是真实的历史。这历史，固然应该包括真正的光荣与豪迈，但更应该把我们所遭遇、所忍受、所经历的劫难、荒诞与耻辱写下来，如实地、充分地把它们写下来，用我们的良心和道德把它们写下来。要让我们的作品，能够在子孙后代面前成为他们前辈诚实和郑重的见证，能够使他们从中真正触摸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灵魂，真正得出“这是为什么”的科学答案，从中获取书写新历史、开创新世界的精神资源。

我觉得，李泥的这本书就是这样做的。无需我多说，只要读读本书的《采访手记》和《后记》，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她所作的是怎样的努力，而这种努力又是怎样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支持了。

张若名和她的儿子杨在道

反右运动中，张若名认为儿子杨在道思想有问题，把儿子写给她的信统统上交党委，一心想依靠党来教育儿子。1958年6月“反右补课”中，儿子被补划为右派分子，她和丈夫也都遭受严厉批判。她破灭了一切希望，投河自尽了。

一代才女张若名，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五十六年。她短短的一生，多彩而又辉煌，曲折而又悲惨。

“五四”运动前后，她是天津“女界爱国同志会”的领导骨干，“觉悟社”的创始人之一

“五四”运动那年，张若名十七岁。她是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，和邓颖超同为十级同学。

北京爆发“五四”运动的消息传来，同学们被正义的吼



张若名1920年在天津出狱后难友合影。前排左张若名，右郭隆真
四排右二周恩来

声震荡了。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在高班同学郭隆真的带领下，同学们纷纷投入运动。她们在女师召开了爱国学生代表会，张若名、邓颖超、王贞儒被选为十级代表，参与各项工作。接着，她们又联合其他女校学生，成立了天津“女界爱国同志会”。刘清扬为会长，郭隆真、张若名、邓颖超为评议委员。评议委员会是“女爱会”的决策机构。

少女张若名热情勇敢，并具有宣传和组织才能。不久，她又被选为“天津各界联合会”代表，并担任戍务干事，负责后勤及财务管理。

1919年下半年，在反对中国驻巴黎和会代表在“凡尔赛和约”上签字和要求严惩山东镇守使马良枪杀回族爱国同胞等斗争中，张若名和郭隆真、刘清扬等作为天津代表，和全国各地的学生代表统一行动，多次进京请愿。即使在军警的刀枪棍棒下，她们也毫不迟疑，从不退却。

当时，张若名分工负责宣传、联络以及营救等方面的工作。她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农家姑娘，不断穿梭于京津之间。

8月23日这一天，天津代表在北京被军警打伤，郭隆真、刘清扬被捕，形势严峻。张若名连夜赶回天津通报情况，商讨对策。“天津各界联合会”立即派出第二批、第三批代表进京。与此同时，周恩来、张若名等上街演讲，发动群众，前往天津警察厅请愿。

28日，张若名又作为第四批代表进京，到新华门请愿，当场和八名男代表一起被捕。在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下，北京政府不得不在两天后释放了他们。

9月2日下午，周恩来、谌小岑、关锡斌、郭隆真、张若名等，在从北京返回天津的列车上，商讨了下一步的行动。大家认为当前最重要的，是把一切爱国力量都紧紧团结起来，联合起来。郭隆真说：“今后女界爱国同志会要和学生联合会紧密配合，步调一致。”张若名提议：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学生，索性全体加入天津学生联合会。周恩来进一步提出，从两个团体中挑选一些骨干，组成一个比较严密的团体，并创办一个刊物，宣传进步思想。他们的意见，大家都非常赞成。

几天后，周恩来从学生联合会干部中，提出了一个十人名单，准备和“女爱会”的代表组成一个联合团体。张若名她们也从“女爱会”学生骨干中，提出了一个八人名单。后来，本着男女平等的精神，又增补了两名女生骨干。

9月16日，由男女骨干各十名组织的“觉悟社”正式成立，并创办刊物《觉悟》。

不久，“女爱会”和“津学联”联合成立了一个“执行部”，张若名被推选为部长。在此基础上，12月10日，进一步成立了“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”。在这一新学联中，张若名

被推选为评议委员会委员长。在当时男女有别、男女分校的情况下，天津男女学校联合组成学生会的举措，像一声春雷，震撼了全国。

她一心要自立于社会，率先提出“女子解放要从我做起”



五十年代的张若名

张若名不仅有强烈的爱国精神，还有着鲜明的男女平等观念。

1902年，她出生于河北保定地区清苑县温仁村，一个拥有十几口人的大家庭。父亲张绍文在广西陆军测量局任科长时，娶了一房姨太太。带回老家后，张若名的母亲被抛到一边，沦为家中奴仆。从早到晚，干着繁重的家务，伺候一家老小，还备受歧视。

母亲没有文化，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在被子里偷偷哭泣。熟睡中的小若名，常常被母亲的哭声惊醒，她幼小的心灵被深深刺伤。

她恨父亲，恨这个摧残母亲的家庭。她甚至诅咒婚姻，想着自己长大以后，宁可削发为尼，也不嫁人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她看清了男尊女卑是怎么回事，她以母亲为鉴，一心要读书，要学本领，要自立于社会。

她的二伯父是日本留学归来的医生，在天津开了一家医

院。在二伯父的支持下，张若名来到天津上学，开始走上了一条奋发图强、谋求独立的人生道路。小学毕业后，进入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。这是当时中国北方历史最长、教学质量最高的女校。张若名有幸来到这所学校，受到良好的教育。

经过“五四”运动，张若名的思想更加活跃起来，从家庭到社会，有关妇女问题，她想了许许多多。在第一期《觉悟》上，她发表了《“急先锋”的女子》一文，论述女子求解放的途径。她说，“女子解放要从女子自己做起，不要等着旁人来解放。”她指出，女子要解放，首先要改变自己的旧观念：“女子受数千年的恶习，一切不解放的思想，不平等的制度已经深入脑中”，“应当用革命的精神加以推翻”。她提倡“实行男女同学和共同操作”，提倡“男女要有公开的交际”，还提出“婚姻是女子解放中的一个问题，但不是个绝对大的”。她认为，“女子解放重要的问题，还是在智识供给，经济独立……有了充分的智识，独立生活的能力……婚姻问题不解决自解决了。”

年仅十八岁的张若名，能把妇女解放问题，论述得如此深刻，如此透彻，如此大胆，足以说明她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智慧和勇气。

1920年1月29日，在抗议“福州惨案”的斗争中，天津发生了“一·二九”惨案。周恩来、于方舟、郭隆真、张若名等请愿代表被捕，关押在营务处。

张若名和郭隆真同关一屋。寒冬腊月，没有火炉，没有棉被，只有空空的床铺，还有地上厚厚的土。原来，这里是关押盗贼的拘禁所，夜里常传来阵阵犯人被拷打的惨叫声。她们裹着军大衣躺在床铺上，难以入睡。

第二天，她们开始与看管人员交涉，争取起码的生活条

件。关押在营务处的二十多名学生开始秘密联络，展开狱中斗争。他们集体绝食，议非法长期关押，要求公开审判。当局不得不把他们转移到检察厅拘留所，听候法律审判。

张若名的父亲张绍文听到女儿坐牢的消息，从老家来到拘留所，劝女儿“改邪归正”。他说：“你只要承认错误，就可以提前取保释放。”张若名没有接受父亲的“好意”，理直气壮说道：“学生抵制日货，游行请愿是应该的，爱国的，合法的，正义的……”

张绍文大为恼火，向在场的狱吏喊道：“我不认这个女儿了，你们枪毙她算了！”

在开庭公审的日子里，北京著名爱国律师刘崇佑自愿出庭，义务为学生们辩护。经过近半年的努力，周恩来、张若名等被关押的二十六名学生全部获释。

她和周恩来、郭隆真等一起登上波尔多斯号轮船，赴法勤工俭学

出狱后，张若名按学校规定，回到原籍保定。她的二伯父这时在保定河北医科大学任教，她就没回清苑老家，而住到了离家六十来里的保定城二伯父家里，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。

家中父亲怕她在外面“闹事”，再惹麻烦，就一面对她封锁消息，把“觉悟社”寄给她的开会通知扣留下来；一面赶紧给她找婆家，想用婚姻束缚住她。

她决定赴法勤工俭学，彻底离开这个家庭。当时保定留法预备班正在招生，她悄悄地报了名。

不久，她的堂舅也去报名，在报名册上发现了她的名字，于是，她的父亲也知道了，决意阻拦她。知道对她来硬的不

行，就谎称她母亲病重，让她速返老家，并派专人到学校去接她。张若名十分清楚父亲的用意，知道自己的赴法秘密已经泄露，决定提前行动。她打发走了专程来接她的人，赶紧做逃离准备。

两天后，她带上身边仅有的二三十元钱，跳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，与郭隆真会合了。

赴法勤工俭学，是当时许多有志青年的一条出路。但是，摆在张若名、郭隆真面前的困难是没有路费。这时，又是爱国律师刘崇佑先生伸出援助之手，资助了她们三百元。与此同时，周恩来也设法筹措了一千元。

1920年11月7日，周恩来、郭隆真、张若名等一百九十七人乘坐波尔多斯号轮船，从上海驶往法国。

在法国帮助安排郭隆真和张若名住宿，并负责教她们法语的，是已在法国蒙特利埃农校读书的盛成。他是“五四”运动中长辛店铁路工人的领导人，已加入第三国际法国共产党。

1921年1月，张若名和郭隆真开始跟盛成学习法语。1992年盛成撰文回忆说：“若名法语的进步，可谓一日千里，到1921年暑假时，她的法语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了。”

为了维持生活，张若名还为北京《晨报》写稿（出国前她被聘为该报的特约通讯员）。她在该报发表的文章《留法俭学生之恐慌与华法教育会》、《留法俭学生最近之大觉悟》等，后来分别收入了《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》、《留法勤工俭学运动》等书籍。

1921年夏，因为盛成太忙，不能教她们法语了，她们就搬到周恩来等人所在的布卢瓦居住。在这里，他们经常一起探讨国内政局和十月革命的经验等。当时的周恩来已经加入共产主义小组，并于1922年上半年和赵世炎、陈延年等人在



张若名在法国

巴黎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。郭隆真和张若名随即加入“少共”，并迁往巴黎，到一家云母片厂做工。

“少共”的任务之一，是学习共产主义理论。他们成立了“共产主义研究会”，互教互学。由于张若名能够阅读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，经常担任主讲人。她的发言，得到大家的赞赏。根据周恩来的建议，这些讲稿被整

理成《阶级斗争》、《剩余价值》等文章，发表在党报《赤光》上，继而又印成小册子，供大家学习。1924年周恩来奉调回国时，还把它们带回广州，铅印出版，公开发行。

团结争取华工，是“少共”的另一项任务。为此，郭隆真和张若名又来到华工比较集中的里昂，在工人中开展工作，发展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。

由于张若名已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，又是女性，身份隐蔽，党给了她一项特殊任务：和法国共产党保持秘密联系，取得他们对旅欧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支持。

退出“少共”，专心求学，成为我国赴法勤工俭学的第一位女博士

1924年，张若名退出“少共”。事出有因——

首先，她的党员身份暴露了。那年1月21日，列宁逝世，法共里昂支部决定举行大型追悼会。他们通知旅法中共派代表参加，并在大会上发言。可是，开会前两天，法共得到情报，法国政府将逮捕参加追悼会的外国共产党员。法共紧急通知中共，不要派代表参加大会，发言稿由他们代为宣读。但当时的领导人不听法共意见，坚持派代表参加。张若名被指派为代表，并在大会上发了言。会后，法国秘密警察果然找她麻烦，险些被驱逐出境。从此，总有法国警察对她盯梢，或调查询问，使她无法再在法国开展党的工作。

那位使她暴露了身份的领导人，是接替周恩来担任“少共”书记的。他专横跋扈，总是轻易地否定别人的意见，还动辄训人骂人，郭隆真就曾被他训得痛哭流涕。张若名对他无法容忍，更促使她决心退出“少共”。

或许，从根本上说，张若名是一心想求学深造，沿着女子自立自强的道路走下去。何况这时她得到碧细女士（美籍）的资助，已经在法国里昂大学听课了。

碧细女士的丈夫于格儒，曾经是法国的参议员。死后，碧细将他的遗产捐赠给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女学生，资助她们深造。这个机会对张若名来说太难得了，怎能轻易放弃？

看来，求学深造对于她，比从事政治活动有着更大的吸引力。但是，与她同生死、共患难的同志们仍在继续战斗，她与她们有着深厚的情谊，难以割舍。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，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政治，继续求学的道路。

1924年下半年，张若名向组织表明退出“少共”的愿望，得到批准。

不久，周恩来奉调回国，郭隆真被派往苏联学习。张若名搬到一所天主教女子中学的学生公寓居住。这里非常安

静，有着良好的读书环境。除了上课，她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学习。

三年里，她攻下了《心理学》、《普通哲学与逻辑学》、《伦理学与社会学》等课程，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学习，享受公费待遇。在取得《教育学》合格证书后，获里昂大学文科硕士学位。

她没有就此止步，继续在里昂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。她攻读的是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，导师是法国著名心理学家塞贡，研究课题是安德烈·纪德。

纪德是法国二十世纪著名作家（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），又是一位有相当争议的作家。他曾承认自己是个同性恋者，他的短篇小说《叛道者》于世纪初发表后即引起争议。有的加给他“精神不健全，反对教会”的罪名；有的“揭起道德的旗帜向他进攻，认定他对人们造成了有害的影响”。后来，他的小说《窄门》、《伪币制造者》等以另外的主题和文风出现，又获得人们的赞赏。

张若名非常喜欢纪德的作品，认为它们“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太特别了”。当她进入这个研究领域的时候，法国已经有了不少研究纪德的论著。她仔细阅读了这些论著，认为有些对纪德的评论有如隔岸观火，不着边际；有的在研究中离开了纪德本人的思想和人格，虽是赞美纪德，但结果或许是背弃了纪德。

张若名用了整整三年时间研究纪德。她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他，产生了自己的独特见解，完成了博士论文《纪德的态度》。

张若名将论文寄给纪德本人。纪德读后，对自己能被一位中国知识女性如此深刻地理解而大受感动。他在给她的回信中写道：“通过您的大作，我似乎得到了新生。多亏了您，